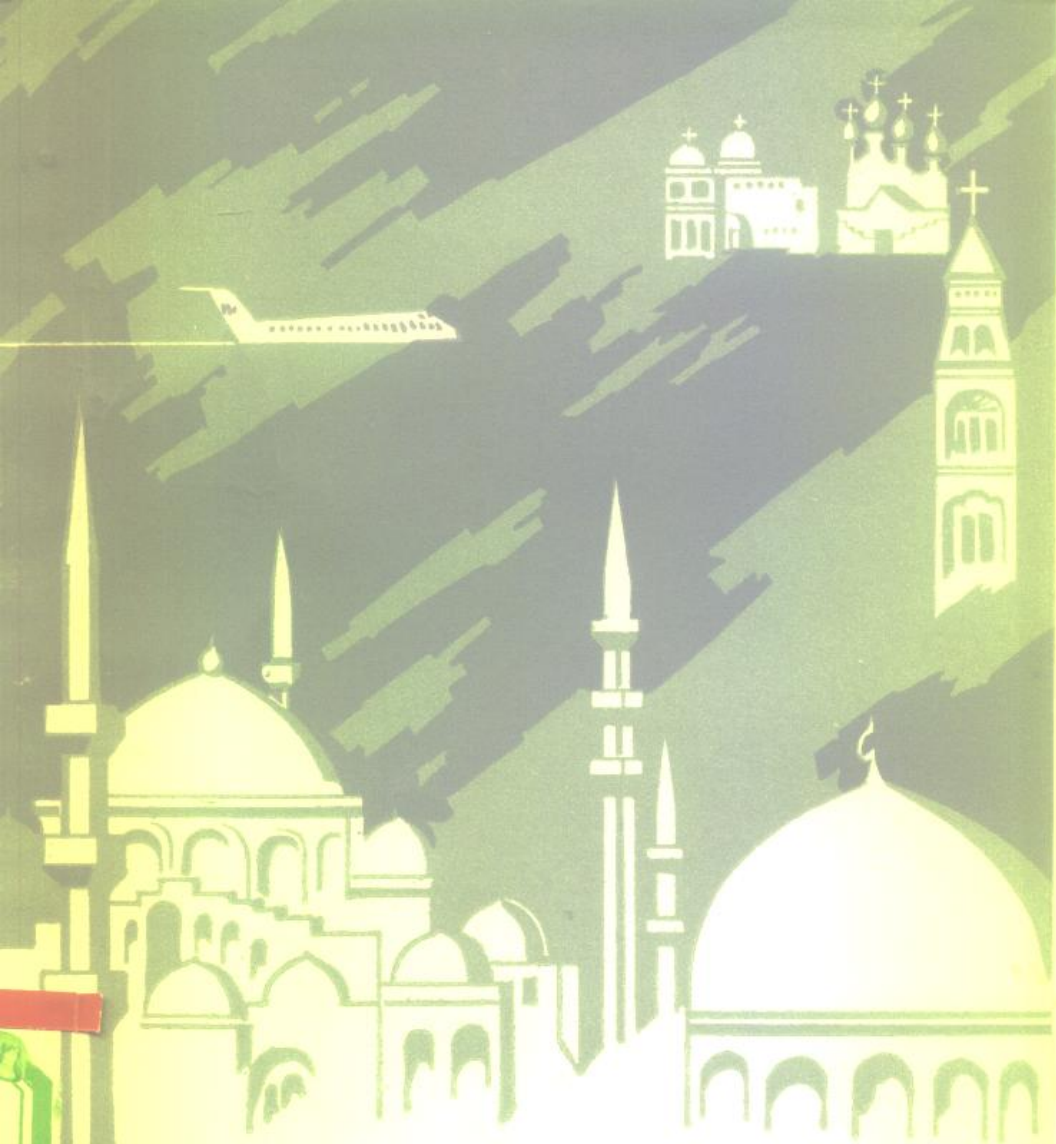




基辛格在中东

中国展望出版社



基辛格在中东

〔以〕麦迪·戈兰

甘应龙 译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一月北京

Matti Golan
THE SECRET CONVERS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

Step-by-Ste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Translated by Ruth Geyra Stern and Sol Stern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Second printing March 1976.

根据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6年版英文译本译出

基辛格在中东

〔以〕麦迪·戈兰

甘应龙译

●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8,8125 印张 193.7 千字

1983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1—19,000册

统一书号: 3271·040 定价: 0.87 元

中译者的话

该书原系以色列《国土报》首席外事记者、专栏作家、战时随军记者麦迪·戈兰用希伯来文写成，手稿曾被以色列检查官查禁，引起一场波及美国和以色列的轩然大波。本中文译本系据洛斯·格尔拉·斯特恩(Ruth Geyra Stern)和所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英译本《基辛格的秘密谈话》译出。

该书向读者展示出基辛格从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到一九七五年九月“埃——以协议”签订这一期间，在中东主演的一场“和谈滑稽剧”，对基辛格本人贬多于褒，即描述了他的非凡才干，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多次失误，暴露出他那一套少见的两面派外交手腕，把他刻画成了一个“背信弃义、阳奉阴违、玩弄骗术和一贯食言的”政客。该书描述了“赎罪日战争”前夕的紧张态势以及以色列军政情报和外交的混乱，概述了战争进展情况，极详细地披露了一系列幕后会谈、辩论和协商。该书暴露了正式外交宣言与幕后实况之间的矛盾，暴露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个“联盟”内部的矛盾，暴露了以色列摆脱不了美国控制的无可奈何的窘境和以色列领导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同时，也揭露了苏联的伎俩以及苏联和以色列之间的幕后交往，叙述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及双方的斗争策略。

该书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上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以色列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和评述。该书可供

研究西方政治人物，研究中东问题和以色列的情况，研究西方国家的外交手腕，研究美、苏、以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参考。

该书请曹陶仙教授校阅了全文，又经张之骧同志校订。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沧南、朱寄生、王鼎辉、兰棣云、刘艾武等老师热情指教和其他同志协助，谨此一并致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和脚注难免有欠妥甚或错误之处，恳望读者指正。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译于湘潭大学哲学系

一九八二年四月定于湖南省湘阴县人事局

目 录

英译本序	(1)
前 言	(3)
第一章 空运补给：以色列的苦恼，基辛格 的机会	(30)
第二章 为停火而战	(58)
第三章 一百〇一公里：第一步	(86)
第四章 日内瓦插曲	(115)
第五章 第一次穿梭	(135)
第六章 大马士革穿梭	(169)
第七章 为山口而战：最后一步	(203)
结束语	(241)
附 录	(246)
索 引	(261)

英 译 本 序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星期五）早晨，以色列驻华盛顿代办收到一份从国内发来的电报，指示他谋求一次与基辛格国务卿的紧急会晤。国务卿当时在纽约，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也在那儿。事态急剧发展，他们间的电话电报倒是没断，但是，他们却不会晤。第二天，以色列当地时间中午十二时五十五分，内阁正在举行大礼服会议时，有人通知梅厄夫人：战争已经爆发了。

在本书中，麦迪·戈兰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赎罪日战争前夕的紧张态势、外交往来和军政情报的混乱，记述了一直伴随有停火叫喊的战争自身的进展及其随后而来的棘手谈判。戈兰先生作为以色列主要报纸之一——《国土报》的外事记者和专栏作家，窥视了从未透露过的幕后会谈、决断和辩论。他以精确的时间、地点为佐证，介绍了基辛格国务卿从一九七三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爆发，到最近日内瓦脱离接触谈判期间所从事的一切稳步外交活动。

起初，由于一份该书“全是秘密和绝密资料”的官方批复，该书遂被以色列检查官所查禁。拖了四个月，才勉强解禁。就本书所披露亨利·基辛格穿梭外交的每一个私下场面说来，它也许是我们时代最富爆炸性的文献之一。从书中所展示的来看，这是一场圆满的演出，的确是一场圆满的演出。但是，这是由于果尔达·梅厄和基辛格相互指斥，基辛格与俄国人从中操纵（对此，梅厄夫人一无所知），基

辛格与萨达特讨价还价，与叙利亚定价论价（在这点上，基辛格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地毯商人）等等，表演得惟妙惟肖，是由于我们在新的灯光环境下来看这场演出才是如此。如果说，在披露基辛格的非凡调停这点上（作者不会透露消息来源），戈兰先生不惜笔墨，那么，对以色列领导集团的淫威、倾轧和苦衷的揭露，也是同样地无情。

戈兰先生抓住国务卿实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键，根据大量纪实材料，描写了基辛格和以色列、阿拉伯、以及俄国的官员们的交谈和会晤，描述了基辛格与参议员杰克逊以及和美国犹太人领袖的交谈和会晤，阐述了在对以色列空运问题上，基辛格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争论。

这本书透彻明了，可以使你对危急（也是在继续着的）事变一目了然。特别是当和平在中东危如累卵，紧张局势威胁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时，没有一个读者——纵使他不那么关心世界和平——不能被《基辛格的秘密谈话》^①一书的内容所触动。

^①这是英译本书名，中译本书名系采用原书名。——中译者

前 言

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星期四是赎罪日战争爆发后两年差一个月的日子。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方——日内瓦国联大厦会议厅，厅中央三张桌子摆成了一个马鞍形，一个电视摄影组正等着要摄下这件大事。廊台上的几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又一次目击以色列和埃及临时协议的签字仪式。

下午五时略差几分，联合国紧急部队统帅、赫赫要人恩苏·辛拉斯伟少将进入大厅，在中间坐下。紧挨着他的是美国黑人助手詹姆士·琼斯。

五时正，由三名军官和一名文职外交官组成的埃及代表团纵列步入会议厅，在联合国小组右边桌旁坐下。三分钟后，由两名文官和一名军官组成的以色列代表团也进入会议厅。

气氛阴郁单调。这位芬兰将军（指辛拉斯伟少将——译者注）陈述着预先已征得两个代表团同意的程序：

“尊敬的代表们，我愉快地欢迎你们来到国联大厦。我认为今天应签字的协议如下：以色列和埃及的一个协议、一个附件、对协议附加的几份地图。我提议，现在签字。”

一堆庞大的文件放在桌子上，整整十五分钟后，以色列和埃及的协议签完了字。

我坐在记者席第一排，禁不住往事涌上心头：作为一位

外事记者和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我采访了所有的围绕着赎罪日战争的谈判和协商。我已是第三次来到这个大厅了。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日内瓦会议时。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五月，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此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这次是以色列第二次与埃及在此签订临时协议。

恰好又是这个老地方，我意外地扫兴。什么也没改变。象前几次一样，仪式同样地冷淡，甚至充满敌对气氛。

象被魔鬼抓着似的，两个代表团的团员牢牢地铆在椅子上。他们的眼睛到处扫着，瞟着挂有大壁画的墙，盯着地板，仰视天花板，瞧着辛拉斯伟将军。但他们唯独不投眼于对方代表团。就是进来和出去时，他们也只与联合国代表握手。

这里举行签字仪式时，协议的缔造者却已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在好几个月令人厌倦的谈判之后，亨利·基辛格由于采取了通向和平的另一个措施，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正受到人们的巨大赞誉。不仅在美国，在以色列和埃及也有数百万人持同样的看法。

我早在一九七四年以色列和埃及脱离军事接触达成协议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感觉。象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看到基辛格俨似一个和平天使，来抚慰被战争和困苦拖得疲惫不堪的中东。

但是，在我后来从事记者工作期间，慢慢儿开始听到了一些事情。听得越多越不安，我所听到的和美国国务卿与以色列的那些公开宣言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矛盾。遮人耳目的外交帷幕后面究竟是什么呢？解这个谜几乎使我着了魔。

幸好我能接近这样的消息来源，它们可以使我了解到围绕中东谈判过程的幕后情况。我决定写一本书来揭示自赎罪

日战争爆发一直到为取得同埃及达成临时协议而进行的最新谈判这一期间，当基辛格推进他的稳步外交时，在各次谈判中，华盛顿、耶路撒冷和开罗究竟秘密地干了些什么勾当。

我发狂地整整写了七个月。完稿时，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但是，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必须越过的障碍——以色列军事检查官。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我把手稿交给特拉维夫的检查官时，我根本没想到要我作的改动已超出了常规和较小的范围。的确没料到，书被禁期间，竟会是四个月的梦魇缠绕，我成了宣传品，书成了上层政治阴谋的焦点，以色列政府对此事表现出奇妙的兴趣。禁书的故事很值得阐述一下。这很自然地要与本书通篇所描述的各项政治事件联系，使之成为书本身的最适当的一个前言了。

我把手稿交给检查官伊查克·莎里上校时，我问他检查会要多久。

“如果是有问题的书，要四到六个星期，如果没问题，也许两个星期。”他回答说。

两个星期后，检查官那儿杳无音信。为了见见莎里，我从耶路撒冷家里赶到特拉维夫。他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地说：“这本书确实不寻常，检查需要时间。”

“多久呢？”我问道。

这次他不愿约束自己：“既得检查，就要时间。”当我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时，他答复说：“按照法律，检查官为了检查，可以把书扣留三个月。”

“但是，”我抗议道，“这不是一本传奇式诗集，这是一本与当前形势发展相关联的书，时间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正在努力，一定尽快检查，”这位有礼貌的检查官就这样答应了我。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半点消息，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莎里，问他：“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常规检查。”

“什么时候会结束啊？”

“不久。”

“不久是多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那就难说啰。”

“见见您可以吗？”

“绝对可以，大门始终敞开着。”

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和蔼可亲，见他时，他总是这个样子，总是愿意会见，甚至没有什么告诉我也是如此。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与莎里又约会了一次，但自上次会见以来，什么新消息也没有，只是多次从容的微笑。“常规检查”继续着，又是三次同样的会见，每次我都试图探出更特别的细节，可都是推诿的微笑。然而，我仍相信：既然这是一本政治性著作，不是军事著述，就是他们砍掉某些部份，仍会有个好运气。

五月五日，星期一；我第一次看到了红灯。我挂了个电话给莎里，但他仍没作答复。我带着生气的声音说：“这不可能，”并要求在第二天见见他。他答应见我。下午五点，他挂了个电话给我说：“明天中午十二点，首席检查官要见你。”

我终于开始明白了，这不再是“常规检查。”但我仍在部份删节的范围内考虑着要砍掉这一节，砍掉那一节，也许要重写这章或那章。

晚上十一点半，莎里又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很抱歉。刚接到首席检查官通知，会见必须推迟到星期三上午九时。

“与首席检查官会见的内容是什么？”我问道。

“很简单，他想见见你。”

“这不是非常规的吗？”

“绝对不是非常规的。”

“会引起禁止全书的可能性吗？”

“不一定，这类事情以前发生过。”

五月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时，我走进首席检查官办公室。沃尔特·巴-奥准将正等着我。他，高高的个儿，银白色头发，明亮的蓝眼睛，有礼貌地招呼我坐下，并吩咐他的秘书送来一杯黑咖啡——我也确实需要它。

“严格点说，我现在打算要讲的是官方的看法，”巴-奥开场了，脸上带着生硬的表情，声音似乎是在背诵另一个人写好的台词，“基于它损害国家安全这个原因，我已决定禁止出版这本书。据我看来，这本书公开发行会造成一种没一个国家愿意与以色列谈判的局面，也会严重损害〔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这本书的公开发行可能导致对我军事援助的中断。”

接着巴-奥念了一节关于禁止出版损害国家安全的材料的检查法后，又念了一个通告，这个通告第二天寄给了我。通告说：

1.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你送来了你的著作《对抗和分裂或基辛格在中东》的原始草稿给检查官审查。

2. 我读了这个草稿本，审查了它，以我的职位授予我的权力，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当着出版商的面，在我们举行的会谈中，把我的结论通知与你：既然这本书几乎完全建立在秘密和绝密资料的基础上，同时引用各种文件，根据

我的看法，它的发行将有损于以色列的国防，因此，我禁止这本书发行。无论是书的全部或部分，是一次付印还是丛刊，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用希伯来文还是译文，都一律禁止发行。

3. 鉴于你提交给检查官的材料内容及此中描写，也鉴于你书中全是机密和绝密文件的原始引文，在我们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的会谈中，已命令你：把你准备的各册草稿、书中引用或写作时所依据的机密和绝密文件的各种正本、副本、抄本和打印件等，统统交给我，而且不得迟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正午。此令同样发给了出版商。

巴-奥念完后，我瞧着周围，确信这不是吓得我出一身冷汗而醒来的一场梦魇。

首先打破沉寂的是巴-奥。他现在倒很安静，看起来挺轻松。他说：“这是官方部分。另外，我个人想从非官方角度告诉你，在我作为检查官的这些年间，从未碰见过谁积聚这么多的限禁材料。”他垂下眼皮，语气有点伤感，继续说：“这样的材料只能来自那些地位很高的人物，想到这一点时，我深感忧虑。”

在此同时，我已设法恢复过来，问他：“从书中删掉某些部份不行吗？”

“不行，”巴-奥重又板起严厉的面孔，“书中每一个字都损害国家安全。”

“但是，”我提高了声音，“我熟悉这本书，我知道书中有许多节，也整整有几章根本没什么牵涉国家安全的東西。”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他简洁地回答。在他的眼光

中，既然法律允许检查官作最后裁决，这就是最后一句话了。

“也许重写一些章节还是可以的吧？”我再一次试探着说道。巴-奥这次的裁定没超出规章之外：“当然啦！如果你提交一本新书，我一定尽职检查。”但是，他又补充说，至于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交出我和其他人所占有的手稿和文件后，这才会有可能。我答复说，我手里没有什么文件，只有一些草稿抄件。巴-奥强调说：“我希望在国外没有这本书的副本。”

我再次向他保证，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分手前，巴-奥又加了几句面子话，“假如你想找律师的话，为了能让你找到律师，”他可以立即收回手稿，能够打个小圆通，允许推迟一天送交。我指出我交稿来，检查官让我等了六个星期这个事实后，答复他，这样粗暴的最后通牒是相当奇怪的。但是，这一点我基本上不争了。我仍然相当愤慨。

这时，我所不知道的是，我对巴-奥的所有力争统统都是无意义的，事情已经出了他的手，得由最高政府来处理，得花费总理自己的大量宝贵时间。

从检查官的办公室出来后，我到了《国土报》编辑部。与《国土报》编辑即我的出版人杰肖姆·肖金作了一次短时间交谈。我把巴-奥会见的细节都告诉了他。肖金对检查官的行为感到诧异，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将等正式通知。

驱车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我考虑着，是否把禁书的消息公布给新闻界。我想，公开这消息一方面有可能使检查官为难，使他重新考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变成对威望的争夺，要使检查官回心转意那就更难了。我仍天真地想着还有妥协的余地。第二种考虑更应该重视，于是，我决定不公

布这个消息。

然而，下午六点我刚到家时，真的愣住了。一位议会议员挂来个电话，他问道：

“麦迪，有什么消息？他们禁了你的书？你一切都还好吗？”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你是什么意思？跟我开玩笑吗？”

“不，相当严肃。请告诉我，你从谁那儿听到的？那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呀！”

“你瞎聊什么啦？”他说，“全城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议会里只谈这件事，其它什么都没谈。”

然后，他告诉了我下面这则消息——在那不平凡的日子里，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上午八时，伊扎克·拉宾总理吩咐内阁秘书格肖恩·艾雾呢召集全体阁员开一个秘密内阁会。会议在十点开始。为了保密，要阁员们不坐官方小车，而坐出租汽车到达会场。

几个阁员后来回忆说：他们来到总理办公室的会议室时，确信战争将要爆发。他们看到政府法律顾问，司法部长梅·雪麦加，情报局长肖洛麦·盖则特少将、首席检查官巴-奥等都出席了会议，更增加了恐惧。会议由总理主持。几句话后，许多阁员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总理正在报告的不是紧迫的战争，不是处在紧急关头的国家，而是麦迪·戈兰写的一本书。总理说，这本书以绝密文件为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与埃及、叙利亚脱离军事接触谈判期间，美国国务卿与以色列谈判代表团的会谈记录为基础。拉宾继续说，如果发行这本书，基辛格将会被迫辞职，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无可挽回地破裂。总理念了几段该书的摘选后，司法部长雪麦加

作了法律上简洁的解释，为禁止该书发行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本没几个阁员要求发言，就是那几个发言的也没有表示什么保留意见，他们只要求彻底调查，以发现泄漏这些消息的来源。总理再次向他们保证，正在进行充分的调查，至于罪犯，无论其地位如何都将交付审判。

这次秘密会议的保密时间比政府其它常规会议的保密时间更短。不出几个小时，几名阁员还在议会自助餐厅的餐桌旁继续他们的讨论。当然，紧挨这间高级餐桌坐着的那个人则在偷听，而且听到了几句。几分钟后，这个人站起来把上层权贵们这次谈论的主题告诉了几位记者。原来他们谈论的就是麦迪·戈兰！于是，一条谣言不胫而走，一眨眼功夫，整个自助餐厅和走廊里都在谣传着：政府已经举行了一个讨论麦迪·戈兰的会议，下午一时，议会的外交事务和安全委员会还要为这同一议题召集一个特别紧急的议事会。

然而，麦迪·戈兰究竟干了些什么而得到这么个荣誉呢？在议员们中，猜谜语之风开始兴盛起来，且越来越漫无边际。有一个人记起他曾听到一些关于破获某个间谍网的事，甚至把我的名字也提出来，联到那个圈子里去了。记者们奔向电话，挂到了我家。但是，我正好在特拉维夫团团转。无疑，耶路撒冷肯定演出了一场我没在场的好戏。

下午两点，几位议会记者终于弄清楚了，政府会议的主题是禁止出版我的书。同时，议会委员会会议（Knesset committee meeting）也休了会。其中的两位记者与委员会委员艾夫拉赫·杨福（退役）上将同车去特拉维夫。委员会发生了什么事呢？两位记者缠着这位将军不放。但将军拒绝给他们任何暗示。于是，这两位记者便毫无顾忌地相互交谈着他们所知道的禁书的事情。